

中文摘要

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河北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简称“北方进德”）的研究，来探索和解释现代化背景下制度性宗教与现代性文明所展开的对话，分析天主教的社会功能的转变；挖掘天主教传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共性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的有利基础；探索天主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制度性宗教，在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可能的路径，以及具有宗教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公益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一项人类学的研究，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和其他辅助的研究方法，对北方进德这个个案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其运作机制的分析，作者发现非政府组织是制度性宗教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可行且有效的途径。宗教信仰的背景，可以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价值上的判断和精神上的支持，更具人道性、伦理性和普世性的色彩；而以非政府组织的弹性结构为载体，宗教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并使宗教参与到现代化背景下的公共生活当中去。通过对北方进德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意义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的研究，作者发现北方进德目前所开展的社会公益事业，既能够为当前的社会需要做出贡献，又是制度性宗教在现代化背景下转型的一种探索。

因而，本文的结论是：一方面，制度性宗教需要做出调整，在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到自身发展的新途径，并重新建构其社会功能；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國社会的变迁对社会公益事业的需要急遽增加，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公益事业的行列中来。而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有效的运作模式，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相互满足的途径。本研究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总结：制度性宗教通过非政府组织这个有效的运作模式来开展社会公益事业，一方面寻找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来满足社会对公益事业的需求。

关键词：制度性宗教、非政府组织、社会公益事业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is paper is that by the inquiry study on “Hebei Jinde Catholic Social Service Center” (“North Jinde”), located in Shijiazhuang, capital of Hebei Province,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and explain religion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dialogue under the context of modern institutional; analyze the changes of Catholic social function; explore the common sense on social welfare existing both Cathol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search after the possible path on China social welfare undertaken by Catholic as a mature institutional religion; and discuss the role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based on religious in China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A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the author uses field surveys and other supporting research methods to do empirical study on Beifang Jinde. Through its operating mechanisms, the author found tha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way to undertak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as systematic religious. Religious background can provide value judgment and moral support for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e, ethics and universal. And the flexibility structur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uld help to carry out religious values and beliefs in practice and make religion takes part in public life of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By the stud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North Jinde and the problems it has to face in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en by North Jinde has been bringing double useful impacts: the one is to meet the need of society, and the other one is explor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ligion transformation.

Thus, the conclusion is this: on the one hand, institutional religion needs to make adjustments, and find out their own new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to reengineer its social function in a rational, secularization of modern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eds of social welfare increasing rapidly because of modern society's development and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 it needs all social forces to join in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s an effective mode of operation provides for the supply of a possible way to meet each other. So the logical

relations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ing: institutional religion could carry out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throug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an effective mode of operation and find out their role in modern socie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meet the demand for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ligion,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邢婷婷 日期：2007年6月4日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邢婷婷 导师签名：叶 日期：2007年6月4日

引言

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古来有之，它既是古典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率先探讨的核心议题，又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课题。宗教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牵涉到个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但却不止于此。宗教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社会运动等相互交织、相互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各项与宗教相关的社会科学的议题。

宗教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所谓“古老”，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的宗教，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开展过极具规模的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宗教哲学以及具体的教义信条指导下，许多宗教团体和信众都将公益事业作为自身不言而喻的责任和义务来看待。例如基督教时期的欧洲，在天主教哲学传统的指导下，公共福利被认为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体现，“共善”被看作是有效治理的目标。在前现代的欧洲社会中，天主教是社会功能的核心，肩负着西方社会所有公益事业的责任。所谓“新鲜”，是因为现代社会中宗教力量的式微。现代化的进程宗教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业化、世俗化使得宗教“大而全”的功能逐渐消退，这些功能分化成为了与宗教建制相分割的独立的子系统，制度性宗教逐渐从人们生活的核心位置中撤离出来。宗教仅仅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不再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教会在前现代社会中所承担的各种功能如道德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等，在现代社会中已经由各种专业分工的职能部门所取代。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的社会功能必将经历转型。宗教的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宗教组织，或者说带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将在现代社会的公益事业中扮演何种角色？这已成为探讨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切入点，也为宗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第一章 导论

本文所研究的河北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北方进德”）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创办于1997年5月，是一个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社会慈善组织。从成立到现在，北方进德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农村发展、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以及社会服务等项目上做了大量的社会公益工作。我们以北方进德作为个案，可以通过对它的研究来了解和解释现代化背景下，制度性宗教与现代性文明所展开的对话，分析天主教的社会功能的转变；挖掘天主教传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共性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的有利基础；探索天主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制度性宗教，在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可能的路径，以及具有宗教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公益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研究的是天主教背景的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开展的各种公益活动。如若要对制度性宗教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公益事业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那么，所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来源于这样两组关系——现代化进程与宗教（制度性宗教）转型之间的关系、西方天主教文化传统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对话关系。下面，我们将这两个关系细化为以下几个问题逐个讨论，便是此项研究产生的背景。

1、现代化的进程与宗教（制度性宗教）的转型

在西方国家政教合一的时代里，宗教的社会功能是十分全面的。在前现代的欧洲社会中，天主教是社会功能的核心。天主教会通过组织和个人，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学校、医院。对需要者提供帮助，艺术扶持，交战双方的媾和等等。这些文化和社会的经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社会结构。这一切经过现代化的滚滚巨轮的碾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生活的结构性的变化，原来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工业的生产。与现代化相伴随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社会中结构的分化。与社会结构方面的现代化相伴生的是文

化和道德上的现代性，它将科学的方法和工具理性作为真理之源和进步的基础，自主的自我是个人自由的道德基础，普遍的平等是政治生活的目标。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文化思想的现代性，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

世俗化是西方当代宗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性框架，“世俗化”一词的使用与现代社会本身有着密切的关联，古典社会学家对宗教几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的消亡。Karl Marx 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是统治阶级欺骗和麻醉被统治阶级的鸦片。Web 提出“理性化”的概念，认为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进入了物质的、理性的、经济的“解魅”时代，这个观点对世俗化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Durkheim、Parsons、Wuthnow 等人也有相关的论述，认为由于其理性特征所决定，宗教作为人类理性进化的原始阶段，最终将被科学的发展所取代。^①

Peter Berger 对“世俗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意指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世俗化，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从社会和制度的角度讲，世俗化是指基督教会撤出原先控制和影响的领地；从文化的角度讲，它标志这宗教文学、哲学和历史的衰落；从个人的角度讲，它标志着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宗教的指导和解释（Peter Berger, 1991）。可以发现，Berger 认为世俗化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全部文化生活和观念体系发生变化的过程，是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到微观的个人观念、行为，均与宗教产生分裂的过程。它所想要揭示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宗教力量的衰落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现代意识的拓展，宗教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消亡。虽然 Berger 关于世俗化的论述在后来受到了其他宗教社会学家的指责和质疑^②，但是它对于我们理解“世俗化”这个西方宗教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社会学家 Casanova 在讨论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问题时，给出了三个命题假设：第一是世俗化导致宗教在社会功能方面产生分化，社会活动的不同方面脱离

^① 关于宗教社会学有关宗教与现代社会的理论探讨，更多内容请参见范丽珠《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台北：韦伯文化，2005）。这里只参考了其中关于世俗化理论的内容。

^② 例如 Stark 和 Finke 的理性选择理论（国内也有翻译为“宗教市场论”的），就对 Berger 的世俗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挑战。有关内容可参见《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宗教领域，分化出多个具有独立性的子系统，如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艺术的、传播的不同部门；第二是宗教的私人化，即宗教不断从公共生活中隐退，对私人生活、个人价值和个体道德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怀；第三个假设是宗教公共角色的丧失，导致失去信众，宗教信仰和活动对个人的影响力降低，最终导致宗教的消亡（Jose Casanova, 1994）。在后来的诸多研究中，学者们或证明或质疑或否定这三个假设。其中，宗教功能的分化，已经获得研究结果的普遍支持；宗教私人化的问题，还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而宗教消亡的观点，几乎得到了否定的证明——正如一些社会分析家所言，“世俗化更常见的影响力是宗教权力在公共生活中影响力的降低，而不是宗教信仰和活动的消失和隐退”（范丽珠 & Whitehead, 2006）。

在否定了宗教可能消亡的观点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宗教功能的分化、宗教的私人化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讨。Luckmann 认为，基督宗教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制度性专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中有形的宗教转化成了现代社会中“无形的宗教”（Luckmann, 2003）。在这一过程的最初，教会形式的基督教建立起了强制性神圣体系定义的垄断，与政治经济相生相依。于是，教会的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模型与流行的个人“终级”意义系统之间和谐一致，人们将“官方”宗教内化到自己的观念和行动中去。此时的基督教蔓延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世俗化与理性化导致了社会生活日益走向专门化，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制度之间产生了明确的分割，它们不再需要宗教来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个人的自我认同和道德意识成为一种私人的事务，社会的运行由原先对个体化的控制转变成对社会角色扮演的有效控制。于是公共制度不再关注于影响个人意识和个性形成。个人的意识从社会结构中解放，产生了“私人领域”。以前的宗教社会形式是以神圣体系通过社会的制度结构或宗教的制度性专门化而扩散为特征的，而现代宗教主题则源自“私人领域”的体验，现代社会的“宗教”已从“有形宗教”即以教会为制度基础的信仰体制转化为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无形宗教”。

范丽珠通过对中国深圳特区宗教信仰变迁的研究，也提出，理解现代社会宗教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宗教（religion）”到“宗教性（religiosity）”的转变（范丽珠, 2005）。她借用了 Simmel “宗教性”的概念，指出人的宗教性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是自发形成的人际关心行为方式，并非是客观的建制形式；宗教性是

一种生存品质，一种在世关系和情感所向。传统社会中由宗教所承担的功能作为社会分化之后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与宗教建制相分割，使得宗教仅仅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不在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在走向衰落。但是，人的宗教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由于现代社会对人从全面控制转向社会角色的控制之后，个体得以拥有更多的余地去思考终极问题，信仰形式的退化和弱化却加强了人们对信仰意义的追求。在理性化和世俗化所向披靡的现代社会中，出于对生命意义的渴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对宗教的需要仍然存在着。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使精神世界的多元化成为可能。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打破了传统的、以制度性和专门化为特征的宗教社会形式，给人们的精神世界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它使得人们有机会离开教会宗教的控制，允许个人选择他们自身愿意接受的世界观，从而使个人有更大的自主性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体系。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中宗教并没有被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浪潮所淹没，更它转而以一种更加贴近个体精神世界的需要的形式而存在，帮助个人建立自身的意义体系。

毋庸置疑，制度性宗教已经从原先社会结构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上不断撤出，它的功能逐渐分化、被专业职能部门取代；公共性的特征逐渐淡化，更多的转向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关怀。那么，制度性宗教是否会从公共领域中完全撤出呢？它会发生怎样的转型，去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并保留自身在公共权力中的影响力呢？现代化导致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同时也产生出信仰和价值的多元化倾向，在这个背景下，宗教传统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制度性宗教——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天主教、基督教——在自身的文化中丧失了特权地位，每种宗教必须在全球公共场合与其他宗教站在一起，开始面对一些完全不熟悉的文化境遇，接受自己只不过是社会公共组织中的一员而已的事实。宗教不再是政治和经济的合法性基础，教会不再是终极真理的权威来源，制度性宗教势必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以便在众多开放的文化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便是我们现在讨论宗教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宗教背景和宗教价值导向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宏观背景。

另外，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一下我为何要强调是“制度性宗教”而非泛泛而指“宗教”。“制度性宗教”是宗教社会学家杨庆堃在研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时提出

来的，指的是宗教在礼仪、信仰与组织三个层次上的制度化，主要是有关宗教礼仪、信仰及组织的标准化与规范性的体系。与之相对应的，是散布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散开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杨先生创造出来的特指不同与中国自身的民间信仰的西方宗教的概念。我这里采用这个概念来指代天主教，以此来明确我所探讨的“宗教”的性质和范畴。虽然 Richard Madsen 曾经指出，天主教已经融合为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部分，但是与传统社会中各种形式的信仰和祭祀相比，天主教组织仍然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这里着重强调“制度性宗教”，一方面显示其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区别，另一方面建立其与西方天主教研究的联系，从而将其放置在我的研究框架之中。

2、社会公益：天主教传统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现实

西方社会的慈善、公益、社会福利等事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着很大的联系。在上文中我们提到过，基督教时期的欧洲，在基督教哲学传统的指导下，公共福利被认为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体现，“共善”被看作是有效治理的目标。但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什么广泛的、深远的影响，那么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社会公益事业，在中国是否具有扎根的土壤呢？我们从中国人行善的观念传统、历史上社会公益和福利发展的事实、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根据。

中国社会虽然受西方基督宗教的影响不大，但是做善事的思想观念古来有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便是相信来自人力之外的报应。中国人做善事的观念是与这种报应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报应观念的核心，就是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道德的，人们相信某些力量势必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赏罚人们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好与坏都会得到相应的报偿，善举会得到奖励，恶行将受到惩罚。而这种道德修行的报偿却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中国人相信报应的力量可以降落在整个家族成员以及子孙后代的身上，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而“积德行善”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是非常牢固的。可以说，报应的观念为中国人提供了做善事的心理和观念基础——人们希望通过做善事来给自己、家人和后代带来好的命运，积累精神资源和道德资本，这种价值观在当今中国人意识和行为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活力，尤其是在受城市化影响比较浅显的广大的农村社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报应”观念为当代社会公益的发展依然可以提供文化和思想的基础。^①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以往的社会中宗教对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

尽管多数学者时常强调中国宗族在慈善事业上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西方，而西方社会中教会的重要性大于中国，但是就中国内部而言，宗教与宗族那个对社会公益的贡献更大，则往往没有得到客观而有效的估量。事实上，古代中国的佛教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黄剑波，2005）。谢和耐（Jacques Gernet）指出，六世纪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其义理中含有强烈的行善观念，如倡导慈善、普度众生的救世伦理，这些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行善行为（谢和耐，1991；转引自黄剑波，2005）。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公德论，有极其浓厚的“福报”、“修福”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推动着当时人们的善事善举，而行善也从此成为中国佛教信仰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许多佛教寺院都定期举行法会、斋会、盂兰盆会，虽说主要的目的是布道，但是也有劝导募捐的意向和客观效果。

到了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教会支持开展的慈善和社会公益活动。从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中叶的这100多年时间里，教会组织在中国社会所做的慈善工作的数量和规模都非常可观。早在1834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到中国来活动之初，教会就确认要把医疗事业作为在中国扩大教会影响的手段。在1900年以前，教会在华医疗事业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数量也不多，但它从客观上把西方的医术、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传入了中国。教会慈善事业的另一类形式是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幼机关。对于传教士在华办理的慈幼机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系统的天主教办的育婴堂、孤儿院及聋哑学校。规模最大的圣母院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一万七千余名。英国和美国也分别在汉阳、建昌、威海卫、武昌等地建立有孤儿院或聋哑学校。天主教在近代中国开展的慈善事业的第三种形式是教会救济。传教士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1876年至1879年期间，华北的山东、直隶等5省发生特大旱灾，天主教各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六、七

^① 关于报应观念，可参见范丽珠关于中国宗教信仰基本内涵的讨论。（范丽珠，2003；2005；2006）

十人。1878年，由传教士为主体的“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主要从事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和搜集灾区情报等活动。天主教在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有些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夕（顾长声，2004）。

尽管这些慈善和社会公益活动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部分，可以说它是精神侵略的手段、教会在华生存的战略、争权夺利的策略，但是如果就此而否认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积极结果，也确有偏颇。近代教会在华慈善活动，构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中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历史传统。

接下来我们可以简略地看一下我国现阶段对社会公益的现实需要。

1949年以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革命、社会运动和制度安排，实现了对资源的绝对垄断，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这对中国的公共福利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政府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责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国家体制内定位，才能得到合法性而获得生存权，民间的各种社会团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体制外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几乎销声匿迹。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中开始逐步撤出，留下大量的空白地带，这便造成社会对福利和公益的要求急遽增加的同时，国家为社会提供福利和公益的能力却在下降。当前，我国社会福利需要的缺口相当大，需要社会支持和福利的人群主要包括贫困人口、受灾群众、老年人、孤儿、残疾人等，这些群体的需要则主要是生活保障、医疗和康复、教育发展等诸多方面；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滥用、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对社会福利保障之外的其他公益事业的需要因此显得迫在眉睫。2000年2月，民政部等11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福利现状的报告：“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技术大、增长快，随着家庭结构的转型，社会化养老的需要迅速增长；同时，残疾人和孤儿的养护和康复条件也亟待改善。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由国家和集体长期包办，无法满足现阶段社会的需求”（《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民政部，2000）。这样的需要在农村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我国目前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到农村，而就目前我国现状来看，优良的技术、设施、保障等发达的硬件都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型城市。但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看，农村国土面积广阔，农民人口众多，而农业正是我国的立国之基，这就决定了农村社会对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的需求比城市更为迫切，然而现阶段政府有限的资源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而，一方面，社会对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的要求十分显著；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实现社会化，这就为国家体制之外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发展公益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现实的基础。

3、问题的提出

以上回顾了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概念基础、宗教力量在中国开展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国社会对社会公益的现实需要。可以这样认为，天主教传统和中国民间信仰传统在做善事、为社会创造共同福利的认识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并且分别为各自社会的福祉做出过贡献。再者，天主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组织在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并非只是单纯地在中国传播和履行天主教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同时也将会唤醒中国社会中所固有的、对当今社会的整合与发展仍然有益处的价值和观念。因而，这两者之间的对话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的公益事业的发展，是具有探索性的意义的。

在文章的开始我们已经提到，本文选择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河北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对象所展开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它来了解和解释现代化背景下，制度性宗教与现代性文明所展开的对话，分析天主教的社会功能的转变；挖掘天主教传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共性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的有利基础；探索天主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制度性宗教，在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可能的路径，以及具有宗教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公益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制度性宗教为背景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在西方社会有着很深刻的历史根源，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传统。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开展的慈善事业和福利活动，大多被当作侵华的手段来看待，往往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因而人们很难对它形成正确的认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方进德在中国是否能找到适合它的生存途径呢？作为一个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北方进德如何实现与中国社会的融合？第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撤出以后，为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社会对公共福利的需求却大

幅增加。那么，这部分空白将如何填补？除了政府扮演的主导角色之外，其他社会力量在填补这片空白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当然，这里主要考察的是宗教组织。第三，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团体如果要在我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它将采取何种形式？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教会组织虽然不再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但若要在我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仍然可以将教会组织作为载体，他们只需要对制度进行调整，发展出一套“从政府取向到社会取向的制度（Casanova, 1994）”，那么我国呢？在没有此方面的制度性基础的情况下，北方进德是如何开展此项工作的？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对宗教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宗教在我国开展的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的历史和现状的总括性讨论；第二，是以某个宗教慈善组织或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团体为例，展开的个案分析研究。

1、对宗教在我国社会展开的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的历史与现状的总括性讨论。

如何看待宗教在我国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如何评宗教慈善福利服务的社会影响？如何引导宗教在当代我国开展社会福利事业？学者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基督宗教问题的研究逐渐升温，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和价值观念的开放，国人看待基督宗教的角度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对早先基督宗教在华活动的平角越来越全面、客观，除了传统的文化侵略论以外，社会现代化论、中西文化冲突论、普遍主义的理论取向应运而生（刘继同，2004）。刘继同认为，看待基督宗教与我国社会、文化关系最合适的角度是处境化思考，既注重纵向历史的变迁过程，又关注横向的社会结构关系，还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纵横交织的社会互动影响，用客观、开放和全面的态度认识宗教。因而他采用文献调查与回顾的方法，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的历史北京与社会处境、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服务对象与群体、基督教会兴办慈善福利事业的动机与目的、慈善福利事业的范围与主要内容、福利服务的资金来源与资源、供应组织与类型层面，全面、系统和历史性的研究了近代我国基督宗教的慈善福利服

务。通过这些考察，他总结认为，基督教会的慈善服务是将会进入社会、服务社会、实现文化交流与互相了解的最佳途径（刘继同，2004）。罗锐从传播策略的角度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的在华影响。他认为，除了公开演讲、游街布道、派发宗教刊物等以外，慈善活动也是基督教会在华扩张影响力的中央策略，具体的活动包括，派遣教会医生开办医院，创办教会学校，兴办育婴堂、孤儿院，赈灾救荒等（罗锐，2004）。滕兰花、梁刚毅对近代广西西方宗教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西方宗教在鸦片战争后陆续地传入广西，发展速度迅猛，它们为了在广西站稳脚跟，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信教，也为了宣传宗教思想中的博爱精神，纷纷开展各种慈善活动，为近代关系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滕兰花、梁刚毅，2000）。

除了历史，学者们也对宗教的社会公益活动的现状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刘继同通过研究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现状与政策框架，认为当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将会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也面临诸多结构与制度性的障碍，应有的积极性社会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他认为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湘中与主要问题均说明迫切需要更多政策支持与宽松环境，以促进教会慈善服务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会协调、社会预防等积极性社会功能的发挥（刘继同，2005）。黄剑波探讨了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参与需要和可能。他在文章中谈到，社会福利的完善程度在和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除了政府利索应当扮演的主导角色之外，也应该是社会参与最为广泛的领域。宗教本可以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事实上目前社会发展的场景中很少看到宗教的参与。他通过将社会福利放置在社会发展的大场景之下来进行考察，探讨了宗教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参与的可能性与前景（黄剑波，2005）。李峰从全球治理的视野中，考察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宗教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以信仰为基础的国际性组织，在文化沟通、冲突调解、国际援助、促进经济公正等领域将发挥独特的作用，但宗教非政府组织的伦理性和间接性，既是它的优势所在，同时也是缺陷所在（李峰，2006）。

范丽珠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对中国民间信仰在中国农村社会公益事业中的角色和作用展开了富有意义的讨论。她借助亲自参与的对北方民间信仰进行的大量

人类学调查的资料，展示了中国乡村自我组织的公益活动，从广为流行的社会资本概念入手，讨论了中国民间社会（文化）资源的价值、中国乡村的自治传统以及民间领袖作用等问题，认为在乡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公益活动治理的功能。进而思考如何使基层社会留够保有足够的自治空间，延续文化的传统，而在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回应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因为一些乡民社会原有的社会资源和价值体系不因现代化时代而失去意义，反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范丽珠，2006）。

2、以国内某个宗教慈善组织或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团体为例，展开的个案分析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现在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对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南京基督教爱德基金会的研究上。

Richard Madsen 对台湾宗教团体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和理解制度性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思路。通过研究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在 1999 年台湾大地震后的表现，Madsen 感受到了宗教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变化：个人从内在的修炼转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怀，宗教思考将对个人奖惩的关注转为对社会良机的认识。在慈济功德会建立的医学院中，学生解剖尸体之前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并表示敬意，这表明现代医学实践与传统的佛教信仰联袂，面对人类死亡“普遍”神秘的情境（Richard Madsen, 2003；转引自范丽珠，2005）。Julia Huang 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对慈济功德会慈善活动的全球性参与和跨国性实践进行了分析（Julia Huang, 2003）。她认为慈济功德会超越文化的国际赈灾、骨髓捐助、环境保护和社区志愿者活动，与全球化的经济现象平行，在为台湾的慈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又提供了一种全球化时代超越国家性的文化认同。陈振甫以佛教慈济功德会为例对宗教慈善团体非营利组织管理特点进行了分析（陈振甫，2000）。他认为慈济应当将广大的资源，转换为能与社会文化连结，藉以提升台湾社会的文化水平；同时建议慈济应该与想在台湾村里组织的小区理事会相结合，共同进行小区总体营造，以创造台湾安和乐利的社会。梁双莲研究了慈济功德会在台湾永续发展中的角色（梁双莲，2005），她的研究显示了慈济功德会在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的新课题建立“零垃圾社会”中所做出的贡献。

Katrin Fiedler 考察了爱德基金会的发展模式，爱德基金会优先考虑发展直接

改善人民生活的项目，帮助缺医少药、教育落后的穷困地区开展脱贫工作，促进生态保护，他认为透过爱德基金会的经验可以观察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同时，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的经验也是不断地改变旧有政策的过程（Katrin Fiedler, 2003）。

以上就是目前国内对宗教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关系、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开展公益事业的相关内容的研究。总体上来讲，这些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证调查，从纵向的历史分析到某个横断面的结构研究，从以西方的社会文化为中心到对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的需要的关注，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对宗教在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的总括性研究中，以及以某个宗教慈善组织为个案的研究中，都往往从政策的角度出发，关心的侧重点在于制度性的问题，而忽视了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共性的因素；大都关心的是“做了什么”、“准备做什么”，而较少关心“怎么做”、“为什么做”等。

第二章 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视角

在理论视角上，我选择功能主义的视角。功能主义在 20 世纪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以至于斯温杰伍德将其称之为“一切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一般认为，孔德、斯宾塞是功能主义德开山鼻祖。在他们之后，由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最后，现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成为功能主义德集大成者。最早将功能主义引入到宗教分析当中的式法国学者德库朗热，他运用历史资料论证了宗教、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在古希腊罗马城邦中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宗教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从精神上维系家庭的稳定性；通过信仰和崇拜城邦的守护神，把宗教信仰与市民维护城邦的义务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陈晓毅，2004）。另外一位宗教学者罗伯特森·史密斯在研究闪米特宗教资料时，与早期人类学者弗雷泽、泰勒所不同，也采用了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他从社会集体的角度来分析宗教现象，注重研究宗教礼仪、祭祀行为、图腾崇拜的社会意义，而不是对个人心理的影响。

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对人类的宗教行为和宗教现象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时至今日仍然堪称经典之作。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功能分析是宗教研究领域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方法。在人类学当中，“功能主义”又可以分为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功能主义”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创建的“结构-功能主义”（夏建中，1994）。功能主义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义序宗族研究》等都有着十分浓烈的人类学色彩。

在宗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当中，功能主义是一个经常使用同时也行之有效的分析范式。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对人类的宗教行为和宗教现象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时至今日仍然堪称经典之作。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功能分析是宗教研究领域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方法（高师宁，1991）。最早将功能主义引入到宗教分析当中的式法国学者德库朗热，他运用历史资料论证了宗教、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在古希腊罗马城邦中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宗教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从精神上维系家庭

的稳定性；通过信仰和崇拜城邦的守护神，把宗教信仰与市民维护城邦的义务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陈晓毅，2004）。另外一位宗教学者罗伯特森·史密斯在研究闪米特宗教资料时，与早期人类学者弗雷泽、泰勒所不同，也采用了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他从社会集体的角度来分析宗教现象，注重研究宗教礼仪、祭祀行为、图腾崇拜的社会意义，而不是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吕大吉，1991；陈晓毅，2004）。

德库朗热和罗伯特森·史密斯的宗教学研究在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正式出现在了宗教人类学研究。在他的代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作当中，集中体现了涂尔干对宗教功能的研究。原始部落的信仰和仪式的分析涉及到了宗教的多种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以及个人的社会化功能（涂尔干，1999）。虽然涂尔干在书中没有明确地提出功能主义的说法，但是功能主义的方法事实上已经在他的研究当中得到了运用，这就为功能主义进一步往成熟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涂尔干创造的功能主义的范式在莫斯那里得到了传承和延伸，不过，确定了功能主义在人类学界长达几十年的主导地位的还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

在《文化论—宗教信仰的功能》中，马林诺夫斯基分析了宗教的伦理功能和信条功能。前者指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使宗教具有了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功能；后者指宗教给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马林诺夫斯基，1987）。马林诺夫斯基将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知识，处理的是那些危险的、不确定的和反常的事物。“宗教注意到自保本能的另一套势力，使因生的欲求而来的积极冲动得到圣化的作用，变得有条有理，于是人心乃得安慰，乃得精神上的完整”（马林诺夫斯基，1986；2001）。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宗教与科学在人类社会当中都各具功能，科学并非高宗教一等，而“反科学”的巫术行为可以满足特定社会中人们的需要，所以具有它独特的功能。宗教不仅具有使人精神得到完整的功能，还有使社会得到完整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1986）。马林诺夫斯基强调宗教的基础就在于人的生物性本能，宗教与人类的基本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就决定了宗教的功能。

功能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分

析宗教的功能时认为，任何宗教都是其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复杂的社会体系的一个方面，凭借这个体系人们才能共同社会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关系安排之中。所以他认为，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宗教的研究并非探索宗教的起源，而是分析宗教的社会功能，即宗教在构成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宗教本身的真实与虚妄无关，重要的是，它是社会机器的基本组成部分。宗教仪式可以独立于信念之外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拉德克利夫-布朗，1999)。布朗从社会学的角度，主张仪式行为是社会秩序的体现，对社会结构的构筑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王铭铭，1998)。

通过对功能主义范式下的宗教研究的回溯，我们不难发现，库兰茨和罗伯特森·史密斯两位学者对宗教的功能主义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他们的研究对涂尔干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在涂尔干解读和分析宗教仪式的时候，功能主义的范式则凸现了出来。布朗继承并拓展了涂尔干的社会、功能方面的理论，创立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他强调宗教并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满足社会的需要；宗教的存在，就是为了维系社会的存在，促进社会的整合。马林诺斯基对宗教功能的分析则以宗教能满足个人的需要和心理的需要为特征。

著名宗教人类学家 Melford Spiro 曾经说过，人类的宗教信仰大致有三项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生存的功能、整合的功能与认知的功能(Spiro, 1964, 1987; 转引自李亦园, 2002)。所谓生存的功能就是帮助人类克服种种生活上与心理上的挫折、困难、恐惧、不安，借信仰的力量获得安定、安心与安全；所谓整合的功能就是借助共同信仰以巩固团体的凝聚力、整合社会的组织力，发挥人类社群关系的至高境界；所谓认知的功能则是满足人类对终极意义的困惑，提供对人生、宇宙、存在与道德等根本问题的解答。在宗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当中，功能主义是一个经常使用同时也行之有效的分析范式。本研究就是从功能主要的角度出发，探讨和研究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在这样一个转型的社会中承担了怎样的一种社会角色，它是否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因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研究是分析转型时期制度性宗教慈善服务的基线研究，是针对一个时间点展开的横切面的结构分析，而不是线形纵向发展的历史研究。

二、研究方法

在上一章中，我向大家叙述了研究问题的缘起，提出了本研究的核心议题，回顾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各类文献资料。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确定了本研究的理论视角。需要研究的问题和理论视角都确定了，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确定运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来完成这项研究了。作为一个人类学的文本，首选的方法无疑是田野调查，但是为了使研究完善期间，还需要选择其他的方法来弥补田野调查中的漏洞和不足。作为田野调查的补充方法，我还选用了文献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对象主要来自北方进德的出版物和网站中的相关内容。下面我将分别具体叙述这两个方法的选取、实施过程和存在的问题。

1、田野调查

2005年12月，我跟随导师一行来到河北省邯郸市进行展开“华北农村民间文化系列研究”中的一次田野调查。在此次河北之行中，我们访问了邯郸市成安县艾束村天主教堂郑神父，详细了解了关于在北方进德资助下他在艾束村帮助当地村民打井的全部过程。2007年初，我再次来到河北，这次是去石家庄“北方进德”总部以及北方进德在石家庄的其他分支机构展开田野调查。此次石家庄之行，我主要访问了北方进德总负责人张神父、日常工作负责人韩神父；在北方进德“老年之家”养老中心主任李修女、紧急救助项目负责人张教友、赈灾支援项目临时负责人赵教友等，并了解了即将展开的防止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的相关内容。此次田野调查期间，我还参加了由北方进德主办的“首届河北省天主教女善会会长培训班”的部分活动。通过田野调查，与北方进德的相关项目负责人、河北天主教会基层的神父进行座谈，了解北方进德近些年来在河北和全国其他地区开展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出发点、内容、介入社会公益事业的方式；了解他们与天主教会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的交流、接触，以及他们在开展社会公益事业时如何处理与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就从访谈对象的选取、访谈提纲的设计以及参与式观察方法的运用来具体介绍一下我的田野调查的实施过程。

首先是访谈对象的选取。我从三个层面选取访谈对象：第一个层面是“北方进德”的负责人，如张神父、韩神父。通过对他们的访谈，我想要了解的主要内容是“北方进德”的工作理念、指导思想，关于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宏观计划和

总体涉及。他们的工作是战略性的，从大方向上决定了北方进德的发展取向和选择的路径。与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他们开展的这些公益项目的意义、如何处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处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他们所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与教会内部的慈善有什么区别、他们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如何处理与国际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将在文章的第二章中得到反映。但是，和他们的谈话不免会给人留下一种“空洞”的感觉，获得的资料往往是一些想法、理念，或者是已经达成的目的、获得的成果等等，而不能了解某一项工作的实施过程，从中洞悉北方进德实际的运作方式和工作策略，于是我需要第二个层面的访谈对象作为补充。第二个层面的访谈对象是“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的具体实施人员，也就是修女、修生、在教区主持教堂工作的神父等人员，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的实施计划通过他们变成现实。这个层面的访谈对象包括艾束村天主教堂郑神父、“老年之家”工作的修女、“希望之光”牛神父、李修女、冯修女等。除了对艾束村郑神父的访谈内容不由我主导之外，其他几位神父和修女的访谈，都是建立在我对北方进德这几项具体的公益事业的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访谈提纲是在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进德公益的报道之后设计出来的，针对性比较强。与他们的访谈除了可以使我了解到北方进德一项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实施过程和遇到的问题，还可以跳出我的访谈提纲，了解到一些他们工作中遇到的有趣的事情，而这些都是我在设计提纲的时候所想不到的，而这些意外的收获对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北方进德”的角色和制度性宗教的转型实践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层面的访谈对象是“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的受益者，也就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他们主要来自“老年之家”。这个层面的访谈对象只是该研究的一项辅助性工作，主要目的也是考量社会公益组织的社会角色、承担的功能和宗教转型的影响。

其次是访谈提纲的设计。我的访谈提纲是根据上面三个不同层面的访谈对象而设计的。第一个层面的访谈主要是针对一些宏观性的问题，在访谈提纲的设计上开放性比较强，它对被访者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这一部分的提纲中涉及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北方进德”开展的这些公益项目的意义、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作用的定位、他们通过怎样的举措建立与社会其他组织部门的联系（例如：如何处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处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他们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如何处理与国际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他们所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

与教会内部的慈善有什么区别等等。针对第二个层面的访谈对象，我的涉及访谈提纲时就相对封闭性强一些，因为通过对他们的访谈，我主要是要了解某一个公益事件的全部经过。例如我在北方进德印刷品上获知了一则关于“老年之家”救助孤寡老人的消息对我的研究很有意义，那么我就希望通过访谈参与过这件事情的神父或修女了解它的经过，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看法，以及事后的影响等问题。又如，北方进德“希望之光”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的时候，是从教会内部先开始的，在教会内部开展了一个阶段的宣传工作之后，才将工作扩大到社会上，在全社会展开“分享生命、珍惜健康”的长期系列活动。此活动的跟踪报道在他们的出版物上联系出现，于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在教会内部开展那么长的宣传之后才推广到社会上去，就这个问题我与“希望之光”李修女和冯修女展开了一次比较长的谈话。还有我们在邯郸成安县艾束村访问郑神父，也是围绕在村子里打水井的件事展开的，希望他能给我们介绍打井的原因、经过以及北方进德和他个人在打井中付出的努力等。第三个层面的访谈对象主要来自“老年之家”，对他们展开访谈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的效果和评价。针对他们的访谈更像是“聊天”，因为请老人直接回答结构性问题收效可能不理想，因而我将问题融入在聊天之中，来引导和老人的谈话。这个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老人在“希望之家”的生活内容、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希望之家”的评价。

再来谈一谈参与式观察的情况。参与式观察应包括一下内容，第一是现场的情景，即事件或者活动的舞台与背景；第二是观察对象的角色、地位、身份、数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状况；第三是人们行动的目的、动机、态度等；第四是社会行动的类型，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行为的性质、细节以及影响等等；第五是事件和行为发生的时间、出现的频率、持续的期间等等。我是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进入观察现场的，我的观察属于无结构式观察，主要是对北方进德“老年之家”的日常工作状况和运作方式的观察。我第二次赴河北进入石家庄进行田野调查时，我向“北方进德”主要负责日常事务的韩神父提出请求，是否可以住在“老年之家”，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对“老年之家”的日常工作和老人的生活状况进行参与式观察。在韩神父的安排之下，我于到达石家庄的当天就住进了“老年之家”公寓。田野调查期间，我每天保持和老人们、修女们一同起居饮食，观察

记录他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没什么访谈计划或者访谈对象有其他安排的时候就和老年人聊聊天，完成资料的收集工作。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田野研究在本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地开展方式是多维度、多面向的，既包括长期的社会发展项目也包括即时的社会紧急救助项目。例如，他们设立诸如“老年之家”、“希望之光”这样的长期的机构，开展打井、修路等长期性的工作；而同时在全国各地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北方进德也会奔赴受灾地区提供人力支持和物资支援。但是田野调查涉及到的更多的是社会发展项目，由于受到地点、时间、偶发性等特点的限制，对于紧急救助的田野调查开展的难度就比较大了，收集资料的困难也增加了。另外，我的研究是从2005年下半年才开始的，而北方进德的社会公益工作从1998年就已经开始了，2000年起便开始有了一定的规模，那么我2000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间的资料就无法通过田野调查来收集。这就需要用其他的方法进行弥补。

2、内容分析

鉴于上述田野调查在本研究中的不足，我们需要再选择一种方法作为补充，从而使资料的收集尽可能全面。因而，此研究中另外一项重要的方法就是内容分析的方法。文献来源主要是河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办、信德室出版的“信德报”（半月刊）、北方进德的出版物和网站（www.jinde.org）。依据这些文献中关于天主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报道，将有关消息按照时间、地点、内容、目标、对象、类型、方式等7个标准，对天主教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的全部信息进行分类，并展开内容分析，时间跨度基本上是从2003年到2007年，分析层面涵盖北方进德这些年开展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各个领域。在全面了解目前全国各地天主教社会慈善服务的现状的基础上，为田野调查和更深入的经验研究奠定基础并予以补充。这里，我也主要想谈一下对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在本研究中的优势和问题。对于此研究而言，内容分析最大的好处在于历时较长，可收集到的信息较多而且全面，我2005年之前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信德》印刷品和北方进德的网站，这无疑对此项研究的时间做了很有意义的延伸，对田野调查的缺憾是一个很好的弥补。但是，它的缺点是不能忽视的。对于报纸和网站上的报道，我只能被动接受然后尽可能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这些报道都受到报道者个人思维、立场的限制，其中很多都带有明显的天主教价值观的倾向，而并非是全面、客观的报道。

第三章 进德公益及其运作机制

以上我们主要交代了本研究的背景、选题、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研究方法。这一章主要有两项内容：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北方进德在目前所开展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内容、方式、对象、特点等问题。接下来，着重讨论北方进德的运作机制，探讨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宗教团体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途径和载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开展公益事业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在正式探讨这些内容之前，我想先对我的研究中涉及到的几个类似的概念——宗教慈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进行辨析，来说明我为什么采用“社会公益”这个概念，并对宗教社会公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宗教慈善是中观层面上目标，主要是指将传播福音与社会服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和活动，这是一种最基本最直接的目标体系（刘继同，2004）。社会福利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为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王思斌，1998），它的对象是所有社会成员，既包括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也包括较高层次的资源保障和发展支持，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此研究中所提到的社会公益，是指关系和影响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社会公共财产与公共设施，是社会所有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物质基础。它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不仅是所有社会成员，还包括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公共财产和设施（例如环境资源等）。宗教的社会公益事业便是宗教组织维护社会公共财产和设施，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这意味着单个教徒和面向教堂内部的服务不包括在宗教社会公益事业的范围内。

一、进德公益在中国

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于1997年5月在石家庄创办，1998年8月获得政府批准，为中国大陆首家天主教非政府组织。2006年4月11日，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中心在河北省民政厅正式登记注册为“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简称“进德公益”。

北方进德是一个由天主教创办的社会慈善机构，在秉承天主教“笃行仁爱、见证信仰”宗旨的基础上，它对这个宗旨的具体内容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发

扬教会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加强与地方教会、社会各界、海外民间机构的积极合作，分享资源，造福人群，推动社会的均衡发展”。从宗旨出发，北方进德将其远期目标定位为发扬基督博爱精神，奉行不分民族、信仰、性别和区域的原则，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向遭遇天灾人祸的个人和社区及时提供紧急援助，向受益的个人和团体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致力于构建一个相互关爱、和谐的人类社会。同时，北方进德将它的发展方向确立为促进社会平衡与持续发展；加强与海内外民间机构的友好往来；为广大信友和教会团体提供服务社会人群的机会；加强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彼此了解与合作。

从内容上来看，北方进德所做的公益事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向自然灾害和天灾人祸中的个人、家庭和地区团体提供紧急援助，慰问灾民、协助灾后重建；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项目，如培训教育、弱智教育、希望小学、医疗卫生（包括艾滋病预防）、安老服务、孤残救助、水利、环保、妇女项目等。从 1997 年中心成立到 2006 年这九年间，北方进德向遭受地震、洪水、暴风雪、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对大火、意外事故和贫病交加等天灾人祸中遭受打击的个人、家庭和团体给予救助，完成了灾区慰问补给、灾后重建、社会培训、学术合作、修建学校、打水井、环保以及医疗卫生等几十个社会项目，提供援助资金共计 1100 万元。同时，中心与“圣召暨教育基金会”合作，为 1762 多名大中小学生提供过共计 128 万余元奖学金。除现有的项目以外，北方进德还计划在近期增加防反拐卖妇女儿童的项目。通过观察北方进德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项目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整体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且互相影响的。一方面，社会公益事业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诸如北方进德此类的组织参与到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中来，他们所做的工作必然会对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对象范围上来讲，北方进德公益事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弱势群体，包括艾滋病携带者、麻风病人、鳏寡孤独、残疾人、特困家庭以及特困学生等；第二类是教会组织所在地的社区居民，例如医疗服务、健康咨询等；第三类是自然灾害造成的需要紧急援助的特殊群体。北方进德在服务对象的范围上，体现出了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它的服务对象既没有行业、地区、部门、

身份的限制，也没有民族、信仰、性别的要求，服务于迫切需要救助的群体，减少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从地域范围上来讲，北方进德是一个全国性的宗教慈善机构，它的服务面向全国多个省市、民族。获得它的各种服务和救助的地区涉及到包括河北、湖南、四川、贵州、新疆、云南、浙江、广西、甘肃、辽宁、重庆等在内的 24 个省市，包括苗族、桐族、彝族、土家族、水族、回族、满族、纳西族、傈僳族、朝鲜族等在内的 16 个民族。北方进德还将它的注意力范围扩大到中国以外的地方。2004 年底，在南亚和东南亚发生地震及海啸后，北方进德通过亚洲明爱与地方明爱向有关国家的灾区发去了慰问函，并向受灾最严重的斯里兰卡明爱捐献 6000 美金。

从服务方式上来讲，进德公益的服务方式基本上符合刘继同对基督宗教公益服务方式的总结，主要分为直接服务、间接服务、中介服务和国内外合作项目四类（刘继同，2004）。直接服务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最主要和传统的服务方式，它为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面对面的救助和服务。这种形式在北方进德是十分常见的，例如对麻风病人的照顾、对鳏寡孤独生活上的帮助、神职人员赴灾区赈灾、打井修路、捐助失学儿童等。与此同时，间接服务在北方进德也发展了起来，例如举办“宗教与环境”学术研讨会、艾滋病防治宣传和培训活动等，根据内容分析中对服务方式的统计，我们可以观察到，间接性服务在进德公益中的比重日益增强。北方进德在中国国内所开展的各项公益事业也引起了国际宗教慈善机构的关注，这便诱发了国内外合作项目的产生和发展。从 2003 年以来，德国 Kolping Society 机构、德国米索尔基金会亚洲部“中国项目部”、美国“天主教紧急援助服务”（CRS）、英国天主教明爱（CAFOD）、意大利明爱等国际宗教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工作人员等先后来到北方进德，进行考察和访问交流。来访者在了解了北方进德在社会发展、希望之光预防艾滋病培训、圣召暨教育基金会帮助失学儿童等方面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后，与北方进德就医疗、艾滋病、健康、农业、教育、紧急援助、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交流，并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目前，英国明爱已经是北方进德的防治艾滋病领域的合作伙伴。

北方进德是一个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慈善组织，它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面向全国不同地区、民族，是从中国社会的需要出发，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和传统背景结合在一起，它的工作策略和方法是以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为前提条件的；与

此同时，作为一个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北方进德能够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与国际上其他宗教慈善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具有了更多的“全球性”的色彩。

二、关于进德公益运作机制的探讨

具有制度性宗教背景的社会团体如果要在我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它将采取何种运作机制？这是一个很有探索意味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虽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并不等于它对公共生活也完全丧失了号召力，社会公益事业依然可以将教会作为组织依托。那么中国呢？北方进德通过建立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走出了探索性的一步。

1、非政府组织：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学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产生原因的讨论中，最显著的两个观点便是“政府失灵论”和“市场失灵论”。“政府失灵论”强调，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市场失灵论”则是由于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超过边际社会成本，市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致使出现了通过市场价值规律无法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效率最高的情况。如果我们从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理解非政府组织的产生，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在政府和市场的机制都产生了缺陷的情况下，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佳组合、社会公正遭到破坏，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而政府和市场本身又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这个时候便需要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来补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给社会所带来的损失，由此便产生了非政府组织。因而，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对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常常是“反主流”或“反资本主义”的（Katrin Fiedler, 2003）。

那么，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是以怎样的姿态介入到社会中去？宗教与非政府组织相结合，对于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宗教信仰的背景，可以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价值上的判断和精神上的支持。宗教，属于精神的范畴，探讨世界的意义，道德功能是宗教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凡物质发展导致功利主义到处泛滥的时期，宗教在维护和重建人类社会的道德信仰体系方面都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非政府组织的

产生和发展同样需要一种道德上的支持和约束,也就是说,它需要建立意义体系。而宗教的基础和背景,恰恰能够满足这样一种需要,使非营利组织有了价值判断和意义支持。

以非政府组织的弹性结构为载体,宗教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从而使宗教有可能参与到现代化背景下的公共生活当中去。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呈现出了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不同。中国的营利组织虽然同样也被认定为非政府组织,但是它较少呈现出“非主流”或“反主流”的特点,而是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并与各种社会事业团体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较少是自愿的,更多地与政府、地方社区、学校等机构相联系来达到自身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弹性结构有利于宗教组织与中国社会的融合,从而找到有效的方式回应社会的需要。

因此,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虽然以制度性宗教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不甚明朗,力量也尚显单薄,但是它是一个有益的倡导,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一个可能、并且有效的途径。

2、其他社会中的宗教非政府组织

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务,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行为主体,它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其组织特性而言,它不仅具备非政府组织的特征,而且还必须以信仰为基础,这样的特性决定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文化沟通、冲突调解、国际救援、促进经济公正等领域的独特作用(李峰,2006)。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一般的世俗组织相比,具有了很多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工作和活动的动机都是从宗教信仰出发的;其次,在其他国家,宗教非政府组织都与宗教机构或某特定的神学传统有联系;再次,该类组织雇用或者招募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出于宗教信仰;最后,它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公益性,并非仅仅针对教会内部。从总体上来讲,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型的角色,但是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化沟通,促进不同宗教和民族之间的了解;调节冲突,维护和促进全面的和平;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扶持自主性的发展;关注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公正。宗教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伦理性和道德

性的特点，是其他世俗的非政府组织所不具备的，这既是推动全球善治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缺陷所在（李峰，2006）。

宗教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它也为我们了解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其他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提供了思路（杨阳，2004）。在美国，宗教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实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宗教非政府组织也通过对外援助这样一个途径，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施加影响力。宗教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非官方、非营利性、自愿的、资助管理的特征，使它们较少地带有官僚作风，容易接触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能够比政府更加便捷地获得有关当地情况的信息，并且更有效实施对外援助。通过对宗教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角色研究，可以发现，它可以作为政府外援政策的游说者、咨询者、合作者和监督者，但是它不能扮演决策者的角色。美国的一部分对外援助和海外救济工作，就是通过宗教非政府组织这类民间志愿性机构来实施的，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的优势，它们与政府之间存在合作与互动的关系；宗教非政府组织通过援助活动在实践组织自身的宗旨和原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一系列政策的实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杨阳，2004）。

3、进德作为非政府组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角色

由于北方进德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慈善机构，因而在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当中，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那样扮演“非主流”或“反主流”的社会角色。而在它的宗旨中，也提倡“加强与地方教会、社会各界、海外民间机构的积极合作，分享资源，造福人群，推动社会的均衡发展”。下面，我们将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北方进德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

第一个层面，北方进德在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当中，将政府作为合作对象，在与政府的合作当中获得政府与民众的认可与接纳。

北方进德与各地民政局、民族宗教局、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在河北、广西、新疆、湖南、湖北、重庆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展开赈灾救助、个人紧急援助、义工培训等工作。2002年8月在湖南岳阳举行的赈灾捐款，得到了岳阳市政府、政协、民族宗教局、受灾地区各乡镇领导的支持与配合。岳阳市政府机构肯定了北方进德的捐款救助工作，认同他们“虽然信仰不同，但殊途同归，共同为社会

人群做贡献”的理念。又如 2005 年 9 月北方进德与广西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在苍梧县、藤县、桂平市和象州县等地展开救灾。北方进德工作人员与自治区宗教局、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混编分组，摸清灾民受灾情况、公布救济花名册、检查救济粮食质量、发放赈灾物资，并走访了部分灾民的家庭。政府部门在与北方进德的合作当中，认为它具体落实和实施扶贫、赈灾项目的能力会超越政府部门。近几年，北方进德与河北省妇联、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残联联合，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了“爱心互动助残培训”，以此引起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关注，并使大学生志愿者了解助残方面的知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着它独特的方面：非政府组织必须在政府部门注册，得到国家的认可；而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和政府提供资源，达到自身发展的目的。Katrin Fiedler 在研究中国的另一个宗教慈善机构——基督教爱德基金会——时发现，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与政府的合作、配合无法分开的。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可以使政府和民众认可并接纳非政府组织；而双方合作对原有政策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促进社会政策的不断改变（Katrin Fiedler, 2003）。相类似地，北方进德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一方面使它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得到了认可，另一方面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收效也更为显著。换个角度来看，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过程当中，北方进德作为宗教慈善机构，它的救助理念与工作方式必然会对政府部门产生影响，这也便成为了一个不断改变旧有政策的过程。

第二个层面，北方进德注重联系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如专业机构、大专院校、民间团体等，将它们的资源优势与自身的慈善事业相结合，拓宽社会公益事业的领域、提高社会公益事业的能力。

“希望之光”是北方进德成立的一个专门防治艾滋病的部门，主要从宣传教育（awareness）和力所能及的关爱（care）两个方面入手，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北方进德“希望之光”一方面由来自河北省艾滋病检测中心、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协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华预防医学会、北京地坛医院等多家医疗卫生机构的专家和医生为修女、教友以及志愿者举办医疗专业方面的讲座、培训班；一方面邀请北京红树林办公室等民间社团组织举办爱滋病防治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以此来提高“希望之光”的慈善工作能力。北方进德举办“大学生体悟信仰、关爱生命”培训班，通过间接服务的方式，吸引来自

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广东、陕西等地的大学生参与其中，动员更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投入到爱滋病防治的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北方进德还联合其他社会力量关注环保事业。2002年北方进德与河北省五大宗教团体、自然之友、绿色之音联合举办了“宗教与环保”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宗教与环保”、“宗教交谈”等话题展开研究和讨论，提出了“更新观念”、“端正认识”、“推广普及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倡议。国际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具有密切联系各种社会力量、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的特征和能力。非政府组织通过动员和团结多种社会力量，在满足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解决一些长期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而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提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北方进德在开展社会公益服务、减少社会不公正现象、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环境的等工作时，与大专院校、专业机构、民间社团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调动和发挥这些社会力量的专业和资源优势，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层面，北方进德作为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它所开展的多项社会公益事业都得到了国际上其他宗教慈善组织的支持和援助。

在上文中已经提及到，英国明爱是北方进德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合作伙伴。2000年北方进德与合作伙伴 ANESVAD 联合资助，在贵州长顺县马路乡中学援建了一栋的教学楼。同年，北方进德又先后与香港明爱、爱尔兰 TROCAIRE 机构合作投资，分别在河北省邯郸市弓庄、河北威县前花町村捐款打井。2005年在河北邢台的赈灾工作中，三个明爱组织为北方进德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强与国际慈善机构的联系，除了可以更多地分享物质上的资源以外，也有助于探索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路径。国际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援助，有利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若以非政府组织组为桥梁展开与国际社会的更多交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克服由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认识和观念上的差异，加强不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隔阂，从而达成关于人类福祉的共识、关注人类的共同福利。而由北方进德等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担任这样的角色，效果将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我们从北方进德与政府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国际宗教慈善机构的

关系上入手，分析了它在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运作模式。宗教信仰的背景，可以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价值上的判断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它与世俗的社会组织相区别，更具人道性、伦理性和普世性的色彩；而以非政府组织的弹性结构为载体，宗教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从而也使宗教有可能参与到现代化背景下的公共生活当中去。以天主教北方进德为例，我们不难看出，非政府组织是制度性宗教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可行且有效的途径。但是，由于北方进德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点，北方进德的发展是与政府的合作和支持分不开的，他们完成的很多项目或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或者是对政府福利行为的配合与协助、或者是对政府政策的响应，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努力使帮扶对象拥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让政府组织和其他天主教徒的老百姓认可并接纳这些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

第四章 进德公益的意义与面临的问题

在上面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北方进德在当前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模式，以及这样一种模式的特点和有效性。在这一章中，我准备讨论一下北方进德这样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在当前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意义。也就是说，我要讨论的是当前我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像北方进德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出现，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这一章我将讨论如下的问题：现代化进程之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公益事业是由谁来承担？怎样开展？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国家政权体系深入到乡村社会，尤其是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几乎全部由国家承担，这样一种“命定的现代化”过程，给中国民间社会带来了些什么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撤出，社会的变化导致对社会公益需要的骤然增加。这个时候，城乡福利差异很大，农村出现了广阔的公益空白地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谁来填补这个空白？在国家的政策调试之外、在中国民间社会资源复苏之际，其他的社会力量是否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希望可以观察到北方进德这样具有制度性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意义。但是，北方进德的产生和发展在我国社会来说，毕竟是一件具有探索性特点的事情，那么它的发展是否会遇到瓶颈？克服和突破的可能何在？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变化路径

中国的传统社会——按照雷德菲尔德的观点——可以进行“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①，在小传统支配下的乡民社会，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研究中曾经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分成上下两个层次：下层社会处于自治状态，有一套自治规则，上层面对下层实际上是一种无为而治

^① 所谓“大传统”是指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而“小传统”乡民社会中一般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在讨论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学者们一般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是断然分离的，它们时常处于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状态之中。也有学者对这种划分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样的划分没有注意到两种传统中各自存在的内部分化；同时这样的划分把“小传统”看成是被动的、没有体系的文化，把都市传统看成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中心（王铭铭，1997）。但是，这种概念的划分在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因而它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

的关系。下层对上层的呼应，是以自治的方式，而对上层统治的渗透是采取应对和妥协的对话方式。（费孝通，1999）这种情况下，民间社会的公益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民间社会中自发生长起来的力量来完成的，例如我们在引言中谈到的传统乡民社会公益事业的两种形式：宗族慈善和宗教慈善。

若要考察传统社会中的公益事业，民间领袖所扮演的角色是必须要引起重视的（范丽珠，2006）。这种民间领袖有可能是宗族中颇有威望的族长，也有可能是地方上受人尊敬的乡绅，在他们的带领下，乡民社会完成自我治理。这种地方精英成为乡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社会的代言人，对国家权力保持影响力，致使地方官员必须对他们有所依赖，才能完成对基层乡民社会的管理。这样，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实际上控制了县政的具体运作权力。在当时国家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不需要为考虑地方精英的参政愿望而扩大国家机器，大大节约了国家的管理成本。在这种意义上，传统乡村社会自治体制这一起稳定结构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因（弗里德曼，2000年）。我们可以将这样一些人称为民间领袖，也可以成为地方精英，总而言之，在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乡民社会的公益事业基本上是靠他们的组织和领导来完成的。他们“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产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张仲礼，1991）”。可以说，在传统的乡民社会中，社会公益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状态之中。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命定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的农村社会在二十世纪经过了非常大的变化，国家政权下移的过程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政权推行保甲制和乡村自治活动，包括某些地方军阀进行的村制改革，实际上都含有建立和强化乡村行政网路的用意，使国家政权体系一直深入到乡村（范丽珠，2006）。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费孝通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化过程进行的非常急剧，上层国家权力拼命往农村基层渗透，把一个自然的社会状态改造成一个人为的行政状态，自然村变成行政村。国家并没有给基层社会留出足够的自治空间，上层对下层的改造，就是彻底改变地方精英作为主流社会领导者的路径及思想观念和

行为方式，乡村社会透过地方精英与国家联结的这一重要纽带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很有可能会使下层被迫担负起太多的行政责任，从而引起基层自治社会的崩溃（费孝通，1999）。肖公权也认为国家政权向下层延伸，破坏了下层社会基本的自治结构。在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对它的回应之间应该给地方社会原有的、被遮蔽的社会史资源以应有的地位和价值（Xiao Gongquan, 1960）。民间社会自治能力的破坏，导致了民间社会活动的停滞，原来井然有序、自给自足的社会公益事业开始走向萎缩。

1949年以后，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全部由国家提供；同时，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导致了社会自发的公益事业消失（黄剑波，2005）。国家和国家体制内的组织才是唯一合法的社会公益的提供者，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国家体制内部找到定位才具有合法性，才具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中，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粮油统购统销、就业统一分配等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支配。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自治和自发组织能力受到全面的压制和剥夺，民间社会公益事业团体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无法立足的程度。

金耀基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称为“命定的现代化”、“被诅咒的现代化”，那么，这个过程给中国的公益事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公益事业的模式，国家介入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当中，成为社会公益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过程破坏了中国乡民社会自治基础，从而使乡民社会丧失了自身完成社会公益和基本福利的能力，将这个很大的负担转嫁到了国家。而国家是否有能力长期承担这些公益和福利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估价的问题。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逐渐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撤出，社会的变化导致社会对公益事业的需要骤然增加：一方面，国家不再包办一切，以前由国家承担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领域出现了大片的空白地带，而过去乡民社会的自治模式已然遭到大规模破坏，已经没有能力来填补这个空白，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国家政策主导下的社会变化导致新的问题不断增加，而这些新的问题如何去解决，又没有什么现成的

模式可供参考。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对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的需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现阶段我国现阶段社会的现实需要。

二、现阶段我国对社会公益和公共福利的需要状况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福利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不适应新社会环境的弊端。当前我国社会福利需要的缺口相当大，其中，贫困和自然灾害是比较显著的两个方面。需要社会支持和福利的人群构成主要有贫困人口、受灾群体、老年人、孤儿、残疾人等，其需要则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康复、基础教育等方面。

黄剑波在一项关于福利慈善、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从贫困问题、自然灾害、社会老龄化，以及孤儿和残疾人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对公益事业和公共福利的需要状况。关于贫困的问题，根据2002年《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报告》的数据认为，戒指2002年底，共有2064.7万城镇居民、819万低保户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大约占到非农业人口的6%。另据2003年《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于2140.3万。相比而言，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要远大于城镇，而且统计起来比城镇更为复杂。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约6000万人（以人均年收入865元人民币为标准），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在自然灾害方面，我国自然灾害的种类多而且发生频率较高，每年全国成灾人口1亿左右，受灾人口将近2亿，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需要救助的灾民一般在6000—9000万人。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增强，自然灾害的损失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外，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也导致了更多社会福利的需要的产生，我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指出，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三亿九千七百万，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特别是随着家庭小型化的发展，社会化养老的需求迅速增长。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繁荣稳定的发达国家。当前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孤儿和残疾人需要社会的照顾和关怀。全国人口统计的数字显示，在中国0

—14 岁儿童中，有残疾儿童 900 余万，占全国同龄儿童的 2.66%，残疾人口的数字大约为 6000 万，约占总人口数的 5%。

在研究我国社会福利需求现状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城乡差别，1949 年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城乡社会福利分布的严重失衡。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至 80 年代初期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断增加，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交通补贴、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洗澡堂、医务室、阅览室、体育场，再到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油以及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高中教育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不仅免交学费、住宿费等费用，而且学生还可以享受到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助学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业或者单位按照职工的工龄和年龄等条件以及家庭人口数目，为职工分配住房。总之，计划经济时代的 50 年，我国的社会福利是以职业为依托、以城镇职工为主体、关怀职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的福利制度。^①但是这样一个大包大揽的社会福利网络并没有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逐渐撤出，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制度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由过去的大包大揽转化成了各种救济金、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措施。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农村地区推出了一系列的福利改革。到 1994 年全国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达 14.854 个，比 1991 年增加 1.532 个，增长 11.4%，社会保障基金会 186.631 个，增加 8.645 个，增长 4.6%。社会保障基金会积累资金额 28.1 亿元，比 1991 年的 16.7 亿元增长 68.3%，其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队从 1991 年试点到现在，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 1100 多个市县开办，共有 5000 多万农民参加了保险。^②但是这些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农村社会福利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 1994 年虽达 14, 854 个，却仅占全国乡镇位数的 31%，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仅占 24%。二、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目前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内实行。没有在全国大范围内大面

^① 相关内容请参见《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和问题》，<http://www.studa.net/sifazhidu/070101/15103956.html>

^② 这些数据来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005242

积推广，社会保障基金调剂范围小，在如何确定福利水平与经济的关系方面国家没有一个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数量规定。三、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存在弊病，从整体上看，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无法承担未来农村老龄化高峰到来的冲击。四、社会保障管理分散，存在发展不平衡，发展缓慢，对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差等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社会对公共福利的需要是非常巨大的，关于虽然国家一直进行着个方面的努力，希望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发展基本保障、提高福利水平，解决在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种种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那么，除了国家以外，我们是否还能依靠其他社会力量来满足社会福利的需要？当民间社会资源在不断复苏，自发形成一种社会公益机制的同时，其他的社会资源是否可供我们利用？在接下来的一个部分当中，我首先将对目前承担我国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各种力量做一个总括性的叙述，然后重点来分析一下北方进德这样一个既具有制度性宗教背景，又扎根中国本土社会；既联系广泛的社会团体，又深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在当前中国社会开展公益事业的意义。

三、北方进德在当前中国社会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意义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的责任，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直到目前为止，我国提供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最主要的力量还是政府部门。以下这些出版物和政府报告，例如《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社会福利黄皮书，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1998—2004）；《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1999—2004）；《中国民政》（民政部机关刊物，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报》（民政部机关报）；《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物司，1995—2004）等，都体现了政府部门推进社会福利的决心和行动。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化问题的日渐加剧等等，社会对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的需要日益凸现出来，但有限的政府显然不能满足所有公益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是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公益事业也就失去了

立足之本、成为无本之木，而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除了国家自上而下提供的公益福利之外，民间社会与文化资本的复苏，使基层社会自发的公益活动也日渐发挥作用。中国民间社会（文化）资源的价值在当代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具有着独特的影响力，中国乡村的自治传统以及民间领袖作用都对农村基层社会自发的公益活动有着领导和促进作用，在乡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公益活动治理的功能。如果能够使基层社会留够保有足够的自治空间、延续文化的传统，从而促进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回应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那么一些乡民社会原有的社会资源和价值体系不因现代化时代而失去意义，反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那么，像北方进德这样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当前中国社会开展公益事业的意义何在呢？通过前文的一系列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在中国社会开展公益事业，既有历史上的继承性，也有理论上的必然性——一方面，它对于现代社会的综合平衡的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社会公益事业是制度性宗教在现代社会当中为自己寻找定位的一个途径。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北方进德开展公益事业的意义所在。

首先，在天主教的宗旨和北方进德秉持的理念的指导下，北方进德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在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服务和援助，对于满足目前中国社会对于公益事业的巨大需要、促进中国公益事业力量的多元化，都具有独特意义。

在中世纪早期哲学家的讨论中，天主教社会思想已经确认追求公共福利是人类社会所有正当形式中的基本事业，人类的尊严和社会的发展都有赖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天主教的宗旨是“笃行仁爱、见证信仰”。北方进德继承了这一宗旨，并在开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中，将这一宗旨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多样化的特点相结合，提倡发扬基督博爱精神，救助对象不分民族、信仰、性别和地区的差异，积极回应社会需要，“为国家分忧，为社会大众服务”。在多民族或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广西、新疆等地赈灾救助时，北方进德都是将社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每年冬天，北方进德都要开展“冬衣暖人心，进德助贫困”活动，每次活动中受助群众不分信仰和民族，既有教内外个人，也有满、汉、蒙、

回等民族的受助家庭，范围较为广大。自 1998 年成立以来，北方进德的救助帮扶对象中以不信教群众居多。用负责人张士江神父的话说，“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我们可以殊途同归，共同为社会人群做贡献”。这样的理念能够跨越由于地域、传统和文化的不同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限制，以关心人类普遍的共同的福利为目的。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Richard Madsen 所言，宗教“具有适应现代性，同时让现代社会人性化的能力。这是因为全球化有助于促使宗教的某种复兴，而这种复兴又会促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冲突”。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极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天主教的道德观念与慈善事业的实践，成为营建和谐社会的一支积极力量。诸如北方进德之类的具有宗教背景的团体能够通过发挥自身道德感召力的优势净化社会风气，其伦理规范有益于社会诚信建设。宗教界积极参与当前中国的扶贫、赈灾、社会救助与发展等公益事业、发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其次，制度性宗教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在国际社会中开展公益事业、促进和平与发展、减少冲突、加强沟通等方面已经初见成果，并且形成一种发展的趋势。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它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力量。但是，通过对北方进德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制度性宗教通过社会公益事业，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为自己寻找新的定位，回应社会需要，并使自己融入到理性化、世俗化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当中。

赵文词对台湾宗教团体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和理解制度性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思路。通过研究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在 1999 年台湾大地震后的表现，赵文词感受到了宗教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变化：个人从内在的修炼转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怀，宗教思考将对个人奖惩的关注转为对社会良机的认识。而在慈济功德会建立的医学院中，学生解剖尸体之前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并表示敬意，这表明现代医学实践与传统的佛教信仰联袂，面对人类死亡“普遍”神秘的情境（转引自范丽珠、Whiteheads, 2006）。在北方进德，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与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共通的地方。北方进德在全国各地展开赈灾救助时，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愿：赈灾救助的目的不仅仅是给灾民一点物质上的援助，而是以此作为契机，让大家体会到宗教的仁爱，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团结和信任的关系，并让那些灾民从灾难中学习到关爱他人、互帮互助的精神。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

到宗教在实践当中所出现的变化，它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怀和社会和谐上面。

在田野调查中，我了解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北方进德“希望之光”从2003年开始举办了爱滋病防治培训班，在最初发邀请函的时候，某地的一位老修女不但不允许年轻修女前来参加这样的培训活动，而且还认为这样的活动肯定“不好”，因为涉及到了“艾滋病”，好像一下子想到的就是与“性”有关的感染渠道，几乎就直接认定了是个人行为的不检点所引发的问题，那么“艾滋病”似乎就直接与道德问题牵扯在了一起，那简直是“犯罪”。在四川南充的农村地区，农民们对现代社会的状况知之甚少，尤其是在艾滋知识方面，不仅他们感觉到这种话题很新鲜，他们也认为这是难以启口的。而北方进德的目的正是要让大家认识爱滋病是怎么一会事、如何通过科学的医疗手段对它进行预防和治疗；对于像爱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这样的弱势群体，唤醒全社会予以尊重和帮助。这样，在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时，宗教信仰与现代科学结合在了一起，克服人们思想上的盲点与偏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观察到，从制度性宗教转型的角度来看，北方进德开展的公益事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性宗教正在不断寻找契机，来适应社会的转变、为自己确立新的社会定位：天主教在价值观念和实践当中所提倡的博爱精神、社会责任、公正和同情，有助于突破由于地域、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同时，天主教积极回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与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如现代科学——结合在一起，关注人类的共同福利。

另一个方面，从中国现实的角度来讲，北方进德所开展的公益活动的意义可以总结如下。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北方进德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那样扮演“非主流”或“反主流”的社会角色。而在它的宗旨中，也提倡“加强与地方教会、社会各界、海外民间机构的积极合作，分享资源，造福人群，推动社会的均衡发展”。一方面，北方进德在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当中，将政府作为合作对象，在与政府的合作当中获得政府与民众的认可与接纳。北方进德与各地民政局、民族宗教局、以及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在多个省市自治区展开赈灾救助、个人紧急援助、义工培训等工作，实践了“虽然信

仰不同，但殊途同归，共同为社会人群做贡献”的理念。另一方面，北方进德注重联系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如专业机构、大专院校、民间团体等，将它们的资源优势与自身的慈善事业相结合，拓宽社会公益事业的领域、提高社会公益事业的能力。他们与医院、医学院、疾病检测中心等机构相联系，举办讲座、培训班来宣传防治艾滋病的措施和方法。与其他宗教团体、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活动，树立人们的环保意识，推广普及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国际经验表明，非营利组织具有密切联系各种社会力量、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的特征和能力，在满足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解决一些长期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北方进德在开展社会公益服务、减少社会不公正现象、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环境的等工作时，与大专院校、专业机构、民间社团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调动和发挥这些社会力量的专业和资源优势，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四、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瓶颈和突破的可能

在前一个小节当中，我们分析了目前中国社会对公益事业和公共福利的需要，这为北方进德这样的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可空间；我们也从资源优势等方面分析了北方进德对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意义。那么，北方进德在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上是否还会存在问题呢？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发展的瓶颈？突破的可能性何在？

1、北方进德公益事业发展的瓶颈与原因

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开展公益事业，涉及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涉及到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涉及到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国家、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化关系；还涉及到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行为模式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像北方进德这样的社会组织现在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遇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给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总结一下，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是我国在公益事业发展方面的制度性设置欠缺。就总体上而言，目前我国的社会公益发展状况还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与国家对慈善公益事业缺乏相关的系统性法律保障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我国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内容的性法规条款及行政文件，这些制度安排与法律法规的缺失，从积极方面讲，

不能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鼓励和推动的作用；从消极方面讲，可能会使得社会性的自发的公益活动有时会陷入无章可寻的状态。所以，北方进德在我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还带有一种尝试性的特点。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北方进德负责人张士江神父认为，进德公益在河北正式注册登记，成为国内首家天主教非政府组织，这是进德公益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公益事业朝着规范方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进德公益将向着一个更加专业化、制度化和透明化的方式服务社会。

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和韩神父、李修女、张教友、赵教友的交谈，我了解到，制度性上的缺失给北方进德的正常运转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干扰。首先是主管部门的多重性导致手续的复杂化和程序的重复性。北方进德是一个宗教组织，所以要受到民族宗教局的管理；而它又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又要受到民政局的管理；同时作为天主教的机构，还要保持和天主教爱国会的联系和沟通。因而，要开展一项工作或者执行一个计划，就需要去多个部门请示或征求批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婆婆特别多”，哪一个怠慢了都不行。其次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脱节，政府部门对于鼓励和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政策不是没有，而是执行不利、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北方进德不能及时享受到政策的好处，这给他们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举一个我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的例子。“老年之家”负责人李修女告诉我，“老年之家”作为一个社会公益性的机构，在水费、电费、取暖费上应该享受一定的优惠，至少应该保持和居家户的生活收费持平。但是现在河北省还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也语焉不详，因而“老年之家”现在还承受着营利机构的收费标准。就是说，“老年之家”的水电费、取暖费的收取是和街上的商店、旅馆等执行同一标准的，而他们又是非营利组织，不能否认这样的收费标准确实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在北方进德今年的工作计划中，有一项就是争取将这些费用的征收标准降低到居家户的水平。另外，负责北方进德日常工作的韩神父告诉我，在收取数额较高的捐款时，应该给捐款人开免税发票，对捐款人的善举表示感谢和鼓励。但是这些是目前的北方进德做不到的。从制度设置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北方进德处在一个“宗教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管理”两条线的交叉点上，它的管理和发展道路都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对于制度性宗教

本身和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公益制度性的建设将有着重要意义。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目前在对于如何认识宗教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如何认识现代化背景下宗教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2001年,当时的国务院经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潘岳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认为宗教在当代中国确实没有消亡,“宗教鸦片论”让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们应该重新认识宗教是文化中永恒的因素,正确评价宗教的正面价值以及它能够为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潘岳,2001)。此文发表之后,在学术界、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认为潘岳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断章取义和歪曲,也有人认为潘岳倡导这样的宗教观必然对大众形成误导^①。对于这样的讨论我们姑且不去做出孰对孰错的判断,也不去追究这样的讨论是基于学术研究的、还是意识形态规范的,只是进行简单的观察和内容分析就可以发现,人们对于宗教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较大分歧。这样的分歧对于宗教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来讲,也不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在北方进德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中,也受到过因为对宗教认识的差异而出现的不认同、不接受的情况。但是,从北方进德、爱德基金会等宗教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开展公益事业的过程,也是一个让政府和社会重新认识和评价宗教价值的过程,还是一个对现有政策和观念产生影响的过程。

以上是从宗教的角度分析了北方进德在中国开展工作的瓶颈所在,而北方进德的另外一重角色是非政府组织。事实上,就非政府组织而言,它在目前中国的角色和地位也不甚明朗。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发展状况比较尴尬,体制外的发展途径难以给非政府组织带来广阔的前景,而体制内的发展途径最后又往往使非政府组织成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和部门。这种尴尬与当前的大背景有关:一方面,国家认识到民间组织发展使时代的潮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

^① 相关讨论请参见以下网站和文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http://www.newage.net.cn/forum/ztxs.asp?id=30204>;《对潘岳同志〈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一文意见》

<http://www.cctb.net/xszm/200502240228.htm>;《潘岳是怎样歪曲马克思宗教观的》

<http://www.kxwsl.com/ReadNews.asp?NewsID=355>;《潘岳:对现代文明必须有一种客观的认识》

<http://www.chinahexie.org/ReadNews.asp?NewsID=3681>。

社会必须大力法政民间组织；但是另一方面，中外历史的经验又使得国家对非政府组织有一种担心失控的心理，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抓限制要比抓发展的力度大得多。像北方进德这样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也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要克服这样的问题、保持自身的宗教价值取向，北方进德就要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一方面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同时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基层民间社会的道德资源和组织形式，将着眼点放在社会的实际需要上，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解决自身发展遇到的瓶颈。

总而言之，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角色还不甚明朗，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还会遇到瓶颈。可以说，对北方进德这样的社会组织来说，未来的前途仍在探索中。

2、突破瓶颈的可能性

北方进德的发展要突破以上这些瓶颈，一方面是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做出调整，但是作为这些组织本身，它们也应该积极寻求道路，适应中国社会，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内容分析，我认为突破瓶颈的可能性主要存在于：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从不同社会中所存在的共性的东西出发寻找发展的土壤。

我去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艾束村天主教堂做田野时，了解到当地一个天主教堂给村里打井的事情。艾束村本来就已经有一口水井，其实天主教堂没有必要再挖一个新井，原由水井属私人所有，每月给村民供一次水。但是，由于村民交纳水费及打水所用的电费不积极，造成大家吃水都很困难的现状。村民交钱很被动。农村用水不像城市，家家都有一个水表。村里的水费是按人头分担的，家里有5口人，就摊5份的钱；有3口人，就摊3份的钱。有村民认为这种收费方式不合理，因为他们家即便有5口人，但有可能常住人口只有2个人，因为有3个人长期在外出打工，所以他们认为自家不应该再交纳5个人的水费，而只交2个人的就可以了。在收费方和交费方双方扯皮的情况下，用水的村民干脆拒绝交纳水费。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有些村民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蔬菜，于是就拿每月从机井买来的水浇菜。这样一来，用水量必然比那些没有种菜的人家大。但是村民家又没有水表，水费全村按人头摊派，就出现了没种菜的人家帮种菜的人家摊水费的情况。种了菜的人家不一定多交钱，没种菜的人家不一定少交钱。

于是，不种菜的人家心里就不乐意了，觉得自己替别人家交水费，吃了亏，便拒绝交纳水费。第三种情况，以 A、B 两家为例，A 家原本按时按量交纳水费，打个比方说交 10 元，而 B 家好说歹说都不交。最后，收水费的人为了收取 B 家的水费，只好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说本来应该收 10 元，最后只收了 9 元，让了 1 元。这样以来，A 家就不愿意了，发现耍赖皮可以占到便宜，于是，在下次收水费的时候也开始抬杠拖欠，目的是尽量少交钱，能尽量多地占到便宜。这样一家比一家，交水费的积极性越来越差，陷入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交钱的家庭要受到不交钱的指责的现象。例如，相邻的 5 家人中，只有 1 家按时交纳了水费，这样就迫使其他 4 家不能过分地拖欠或不交。没有交水费的 4 家便认为是交纳了水费的那家人让他们陷入被动交款的局面，于是他们便会联合起来共同发难交纳水费的人家。

收水费的人对村里的常住人口和外出人口最清楚。因为水费是按人头摊派的，但有些家庭中总有几个青壮年要外出打工，所以他们认为既然不在家里住，收水费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把他们算在内，而是应该按照长期在家居住的人数来收取水费。于是，当这些青壮年要外出打工的时候，他们就来给收水费的人通报一声，希望在收水费的时候不要再收取他们的。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办法行不通，有漏洞，于是又恢复了原来制定的按每家在户的人数收取水费的方式。村子里的机井的电表和水表也有问题。例如电表，正常的 1 度电，这里会显示 1 度 4、1 度 5，甚至 1 度 6、1 度 7，这也成为村民不愿意交纳水电费的一个原因。机井的所有者想从中渔利，也为机井的正常使用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事实上，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需要它来承担的社会公益事业可能都是一些“小事”，但是这些“小事”往往可以解决基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长期“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关系结构中，很多比较重要的福利需求都由国家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恰恰是这些过去由社会自组织承担的打井、修路等公益事务容易被忽视，而这些事情往往关系到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完成这些社会生活最基本的需要的过程中，我们不必在纠缠于国家对公益和福利的制度性安排如何、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宗教认识的分歧如何、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目前的定位和作用如何等等宏观的问题。因而，这些具体到制度性安排很难囊括的“小事”，为北方进德突破发展的瓶颈提供了一种可能。

第二次做田野的时候，韩神父安排我住在北方进德“老年之家”公寓里面，这是一个绝佳的安排，为我展开参与式观察提供了方便。通过观察和访谈，我意识到北方进德突破瓶颈、为纵深开展工作创造可能性的另外一个途径。“老年之家”负责人李修女告诉我，他们讲天主教平等、仁爱的思想贯穿到日常的工作理念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老人心里产生社会排斥的感觉。

他们每年在老人节那天组织老人出门秋游，召集教友做义工，每人负责一位老人，陪伴他们参与秋游的全过程。这样一对一的陪伴，除了对老人外出安全和方便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人陪老人聊天并分享他们在外出游玩过程中的体会，目的是为了让老人觉得有人重视他们。到了晚上，专门在离石家庄市区比较近的地方选一个饭店，带老人们“下馆子”。李修女认为，对于工作人员来说，虽然把饭店的厨师请到敬老院来给老人做一顿饭要方便得多、省事得多，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把老人“带出去”，因为这对老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老人们更看重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他们还能进出饭店、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公共生活的轨道。“老年之家”的工作安排，不仅仅是保证让老人吃饱穿暖，还要不断给老人们的生活增加一些小“盼头”。李修女说，每年快到老人节的时候，老人们就会掰着指头算日子，忙前忙后做准备。有寄托有盼头，让老人们的心情都能好起来。所以“老年之家”今年的工作计划中，有一个项目是从秋天开始给老人们上课，讲一些老年疾病预防和处理的尝试。上课的目的不是想让老人们非得掌握那些知识不可，从时间安排上来看授课也不会太集中，他们的意图是让老人们记得每个星期有两个下午要有点儿事情做。这样让老人们的生活有“盼头”，觉得自己还有事儿能做，就不会产生太多的社会排斥感。

“老年之家”的工作人员认为，宗教更加强调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关怀。满足老人的心理需要，减少他们内心孤独、寂寞、被社会遗弃的感觉，对老人而言要比吃什么食物、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显得更加重要。而我认为，这恰恰是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突破发展瓶颈的又一种可能的途径。

第五章 结语：制度性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社会公益事业

一、研究结论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领导的当代社会，制度性宗教应如何应对，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时对社会做出贡献？现代社会对于公益事业的需要和宗教组织社会慈善的传统，为这样的转型提供了可能性。通过上面三章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制度性宗教需要做出调整，在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寻找自身发展的新途径，并重新建构其社会功能；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國社会的变迁对社会公益事业的需要急速增加，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公益事业的行列中来。而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有效的运作模式，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相互满足的途径。

因而，本研究的逻辑关系可以总结为：制度性宗教通过非政府组织这个有效的运作模式来开展社会公益事业，一方面寻找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来满足社会对公益事业的需求。

我们通过了解北方进德在目前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现状，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宗教组织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有效途径；这个途径在其他国家与社会中都已经有了相关的经历，并日渐扮演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北方进德同其他宗教性非政府组织一样，还在处于探索的阶段。我们从北方进德与政府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国际宗教慈善机构的关系上入手，分析了它在中国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运作模式。宗教信仰的背景，可以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价值上的判断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它与世俗的社会组织相区别，更具人道性、伦理性 and 普世性的色彩；而以非政府组织的弹性结构为载体，宗教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从而也使宗教有可能参与到现代化背景下的公共生活当中去。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领导的当代社会，宗教和非政府组织都希望通过回应人的需要，来使自身得到发展，而这也正说明宗教和非政府组织有可能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非政府组织是制度性宗教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可行且有效的途径。但由于北方进德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点，北方进德的发展是与政府的合作和支持分不开的，同时又与地方社区、学校等机构相联系来达到自身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弹性结构有利于宗教组织与中国社会的融合，从而找到有效的

方式回应社会的需要。同时也让政府组织和其他天主教徒的老百姓认可并接纳这些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

接下来，对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由传统社会中民间社会自行解决公益问题，到集体化时期国家的大包大揽，再到集体化时代结束后，国家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逐渐撤出，给社会的福利供给留出了大片的空白地带。这样的转型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致使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我国城乡之间社会福利状况差异很大，农村对公益事业的需求远远超过城市。除了政府着手改革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以外，中国民间的社会资源开始复苏。北方进德这样扎根本土同时又广泛联系各种社会资源的社会组织，也成为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天主教在价值观念和实践当中所提倡的博爱精神、社会责任、公正和同情，有助于突破由于地域、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同时，天主教积极回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与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如现代科学——结合在一起，关注人类的共同福利。

当然，北方进德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瓶颈性的问题。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的制度性设置还有很大的欠缺；对于如何认识宗教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北方进德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为途径开展社会公益事业，但是目前非政府组织本身的发展状况也还存在各种质疑和限制。要克服这一系列的发展瓶颈，就要发掘基层社会中民众的需要，带着宗教信仰的价值取向，寻找出不同社会中共性的东西作为自身发展的土壤。我们所熟知的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南京的爱德基金会，都兼有非营利组织与宗教团体的双重身份，它们近些年来在台湾、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公益事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而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这种模式的建立所带来的意义，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尽管到目前为止，以制度性宗教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不甚明朗，力量也尚显单薄，但是它是一个有益的倡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正是需要跨越传统、文化和观念的不同，来关注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以非营利组织的市民方向和有弹性的结构为重要的背景，制度性宗教将会为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二、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对现代化背景下制度性宗教的转型和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问题做了实证性的研究，分析了一些可行的途径，也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意义，但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完善和改进。

首先，从研究方法上来讲，田野调查的实施还不够严格：访谈多，而参与观察略嫌欠缺。在第二章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中，我已经提及到了田野调查的不足之处：北方进德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方式是多维度、多面向的，既包括长期的社会发展项目、也包括即时的社会紧急救助和赈灾援助，而田野调查涉及到的更多的是社会发展项目，由于受到地点、时间、偶发性等特点的限制，对于紧急救助、赈灾支援开展田野调查的难度比较大，收集资料的困难也增加了。除此之外，我只选取了文献内容分析作为田野调查的补充，这在辅助性研究方法上也显得有些单薄。

其次，从理论分析上来看，本文在理论的探讨上未能深入下去。本文是选择功能主义作为理论的视角和基点的，在论证过程中，我也努力地用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资料、论证问题。但是，一方面由于功能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宏大与庞杂，而另一方面我所探讨的主题处在现代化背景下制度性宗教的转型、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体系的融合、社会公益事业开展的途径等多个问题的交叉点，因而在对理论的驾驭和探讨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再次，由于像北方进德这样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中，而本文同样也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因而得出的结论还将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和考察。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更加深入和持久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但是本文对于“制度性宗教的转型”与“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性探讨；如果能够为宗教社会学和人类学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商榷的文本，那么研究也就有它存在的意义了。

附录：1、北方进德开展社会公益事业项目一览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目 标	对 象	方 式	类 型
2000-04	河北省威县	捐款打水井	解决村民吃水、灌溉的基本生活问题	河北威县前花町村村民	经济资助、技术援助	社会发展和人群福利
2000-05	贵州长顺县	资助希望工程	促进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	贵州长顺县	经济资助	社会发展项目
2000-11	河北	救助民工和弃婴	关爱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严重烧伤的民工、弃婴	经济资助	紧急救助
2000-12	河北邯郸	捐款打水井	解决村民吃水、灌溉的基本生活问题	邯郸弓庄村民	经济资助	社会发展和人群福利
2001-06	河北石家庄	资助弃婴内脏修复手术	关爱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先天畸形被父母遗弃的婴儿	经济资助	紧急救助
2002-08	河北石家庄	“宗教与环保”学术研讨会, 研讨交流合作	“宗教对话、促进环保”	自然环境资源	学术研讨	社会发展项目
2002-09	河北	慰问赈灾扶贫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捐赠救灾善款	紧急救助
2003-03	河北石家庄	流浪老人吴谢君入住“北方进德老年之家”	关爱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回应老龄高峰	孤寡老人	提供养老场所	社会发展项目
2003-04	河北	宣传预防措施, 应对 SARS 疫情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全社会	信息交流报道	紧急救助
2003-05	河北	修女义工奔赴 SARS 救助第一线, 协助医护人员展开工作	应对突发紧急公共事件	全社会	提供救助服务、号召教友捐款	紧急救助
2003-10	湖南	湘西抗洪, 慰问洪水受灾地区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慰问捐款, 发放赈灾物资, 主要是食品	紧急救助
2004	广西、重庆	慰问洪水灾害受灾地区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筹集善款	紧急救助
2004	云南	慰问地震受灾地区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筹集善款	紧急救助
2005-03	河北	希望之光举办第九届艾滋病培训班	增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意识	河北教区近 80 位神父	学术研讨、培训	社会发展项目
2005-04	云南	首次举办防治艾滋病培训活动	增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意识	来自云南、广西、重庆的近 40 位神父	学术研讨、培训	社会发展项目

2005-06	湖南、四川、贵州	慰问水灾受灾地区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筹集善款、发放物资、为灾后恢复工作提供协助	紧急救助
2005-06	河北	宣讲艾滋病防治知识	增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意识	河北邯郸广平县、元氏县苏阳乡广大群众	社会教育宣传	社会发展项目
2005-07	湖南邵阳	慰问水灾受灾地区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发放赈灾物资和粮食	紧急救助
2005-07	印度洋海啸灾区	捐款	赈灾	受灾地区儿童	捐款, 约 130 万元人民币	紧急救助
2005-08	河北邢台	慰问收到大雨、龙卷风和冰雹袭击的地区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发放赈灾物资, 主要是面粉和化肥	紧急救助
2005-08	广西	慰问暴雨洪灾受灾地区	赈灾	受灾地区群众	发放赈灾款和赈灾粮食	紧急救助
2005-08	青海	捐资助建小学	促进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	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小学生	经济资助	社会发展项目
2005-09	河北石家庄	为村民进行义诊活动, 艾滋病预防宣传	增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意识	赞皇县野草湾村村民	义诊、宣传活动	社会发展项目
2005-09	河北石家庄	“关爱与责任”大学生分享交流活动	婚姻圣事、福传、信仰等主题进行探讨	北京、天津、河北的一部分人学生	联欢、研讨	社会发展项目
2005-12	河北石家庄	希望之光举行河北首届会长及骨干教友培训班	增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意识	河北各教区的堂口会长及教友	学术研讨、培训	社会发展项目
2005-12	河北	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启动仪式	增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意识	广大农民工以及各个社会群体	宣传交流	社会发展项目
2006-01	河北	“关爱社会扎根信仰”的学习班	增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意识	高邑县广大农民	学习交流	社会发展项目
2006 年上半年	全国范围	筹措款项支援家庭紧急援助项目(如疾病、儿童上学等)	发展教育、对抗疾病	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	筹措并发放资金	社会发展、紧急救助相结合的项目
2006 年全年	全国范围	进德公益助学金部资助 408 名学生	发展教育	来自全国各地的贫困学生申请人	筹措并发放资金	社会发展项目
2006 年	安徽、贵州、	捐赠图书、义务	发展教育	地处安徽、贵	教育、培训、	社会发展

夏	河北	支教活动		州、河北等地的 偏远贫困 地区的中小 学生	宣传	项目
2006-12	河北	世界艾滋病日, 进德公益积极 参加社会公益 活动	增强艾滋病预 防和控制意识	邯郸、保定、 承德等地社 会各界群众	宣传交流	社会发展 项目

附录 2、访谈提纲

北方进德访谈提纲（一）

本提纲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历史，功能，问题及评价，访问对象是北方进德的领导成员。前四个要求被访者根据实际情况客观的回答，最后一个是对现状及前景作主观评价。本提纲仅供参考，在访问中视具体情况做相应调整，但务必包含以下要点，同时留意抓住谈话中透露出而未包含在提纲内的有效内容。

历史

- 1、北方进德初创情况（资金、人员、发起人、社会关系）？
- 2、北方进德成立的原因？（宗教因素、政府因素、初创人员的个人因素等）发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 3、2006 年经河北省民政厅批准后，北方进德注册为“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北方进德的发展有什么新变化？

功能：

- 1、北方进德给自己拟定的主要职能有哪些？日常工作包括那些主要内容？常规的公益事业活动主要包括哪些内容？（从开展公益事业的内容选择，资金筹措来源，社会关系磋商三个层次）
- 2、北方进德开展公益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什么？

问题：

- 1、北方进德在开展公益活动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或障碍是什么？（宏观制度方面和微观运作方面）怎样可以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
- 2、如何处理信教与不信教的关系？如何面对宗教、民族等区分？

评价：

- 1、对目前北方进德的发展状况如何评价？它的优势何在？前景如何？
- 2、你认为北方进德对目前中国公益事业的意义何在？

北方进德访谈提纲（二）

下面这个访谈提纲主要是针对“老年之家”、紧急救助、赈灾支援等具体的公益服务项目所设计的，对象是负责和承担这些项目正常运行的日常工作的修女、神父等人。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基本情况、主要问题、自我评价。

基本情况：

- 1、成立时间，成立时的基本状况（资金、工作人员、基础设施），
- 2、成立的初衷；
- 3、如何确立服务对象？如何知道哪些人群需要得到北方进德的服务？
- 4、老年之家/希望之光常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主要问题：

- 1、老年之家/希望之光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如资金、观念、信仰等方面）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的问题又有哪些？如何克服？
- 2、作为一个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常规工作的时候“宗教背景”更多的是一种阻力还是动力？
- 3、老年之家/希望之光主要与哪些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关系？如何寻求合作并处理与其关系？以何种形式寻求合作？

自我评价

- 1、对目前北方进德的发展状况如何评价？它的优势何在？前景如何？
- 2、你认为北方进德对目前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意义何在？

参考文献:

- 1、民政部. 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 [S]. 北京: 民政部, 2000
- 2、彼特·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 高师宁译, 何光沪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3、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4、陈晓毅. 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早期宗教功能研究述略[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2(4) 16—20
- 5、陈振甫. 宗教慈善团体非营利组织管理特质分析——以佛教慈济功德会为例[D]. 台湾: 台湾中山大学, 2000
- 6、范丽珠. 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NGO)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仰的田野研究[M]. 台湾: 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 当代世界宗教学[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
—— 公益活动与中国乡村社会资源[J]. 社会. 2006(6)
- 7、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8、弗里德曼.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 刘春晓译, 王铭铭校.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0
- 9、高师宁. 宗教研究中的功能主义[J]. 世界宗教资料, 1991(4)
- 10、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11、黄剑波. 福利慈善、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论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参与需要和可能[J]. 广西民族研究. 2005, 3(81), 33—40
- 12、黄淑娉、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 广东: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13、刘继同. 香港基督宗教社会服务的基本特性及其社会功能[A]. 见: “基督教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 2001
—— 生存战略或文化交流: 近代中国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概览[A]. 见: 天主教研究论辑(第一辑)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 积极适应与社会服务——中国基督宗教慈善服务现状与政策框架研究[A]. 见: 天主教研究论辑(第二辑)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
- 14、罗 锐. 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策略初探——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为例[J]. 科学·经济·社会, 2004(2), 90—93
- 15、李 峰.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J]. 求索, 2006(8), 96—98

- 16、李亦园 “民间宗教仪式之检讨”研讨会论文集[M]. 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85
- 宗教与神话论集[M]. 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 李亦园自选集[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17、梁双莲 慈济功德会在台湾永续发展中的角色. <http://lsdpg.rdec.gov.tw/PDF/249-8.pdf>
- 18、吕大吉 西方宗教学说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19、卢克曼. 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M]. 覃方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0、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 潘蛟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21、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论[M]. 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 巫术 科学 宗教与神话[M]. 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 21、滕兰花，梁刚毅. 近代广西西方宗教的慈善事业评述[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3），94—98
- 22、王铭铭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重新评估[J].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44-50
-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3、王思斌 社会工作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4、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25、杨 刚 宗教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A]. 见：宗教与美国社会（二）[M]. 徐以骅主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 26、袁 方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7、张仲礼 中国的绅士[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 28、Bellah, Robert.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 London: Harper & Row, 1970.
- 29、Casanova Jose.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30、Geertz, Clifford.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McNamara, P.H. ed. *Religion: American Styl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p.10-29.
- 31、Fan, Lizhu. *The Cult of Silkworm Mother as a Core of Local Community Religion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China Quarterly*, No. 174, 2003, June.
- 32、Fielder Katrina. *We Change Society, Society Change us-The Example of the Amity Foundation*

- In *Quanqiu hua xia de shehui bianqian yu fei zhengfu zuzhi* (NGO), 382—397, edited by Fan Lizh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3
- 33、Huang Julia. *Global Engagement and Transnational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mpassionate Relief Foundation in Taiwan* In *Quanqiu hua xia de shehui bianqian yu fei zhengfu zuzhi* (NGO), 496—515, edited by Fan Lizh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3
- 34、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 Chapter 1-2

后 记

硕士论文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面对七年求学的收笔之作，心中不禁感慨——感慨时间的流逝，感慨周遭的变化，感慨自己七年来的成长点滴——时间竟想不起来该说些什么。有时候太多的言语并不能表达什么，但是我始终明白感激之情应当长存于心。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范丽珠教授。范老师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她对缘分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同。我认识她是缘于大一下学期的公选课“中国宗教与社会”，当时那只是一门随便拉来凑学分的课程，并没有报什么特别的期望，却没有想到正是它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成为我这几年来潜心学习的方向；范老师也常说，那是她在复旦开设的第一门课程，而我则是她认识的第一个复旦社会学系的学生。也许，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吧。这几年来，我的成长历程已经深深地刻上了范老师的烙印——她是一名导师，在学习和研究上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她是一位长辈，在为人处事上时时点拨、处处提携；她是一位女性，在日常生活上热情关心、呵护备至。读研究生这三年中，学习上、能力上，有了点滴的提高和进步，她及时给予肯定；态度上、心思上，有了些微的疏忽，她立刻提醒纠正。我觉得范老师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知识或方法，而是一种一丝不苟、认真到底的生活态度——我相信这一点将使我一生受用。在我即将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时候，我想真诚地对她说一声：“谢谢您！”

其次，我要谢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各位老师，我这些年的进步是你们共同关心的结果。严谨渊博的瞿铁鹏老师，为我打下了扎实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充满活力的张乐天老师，让我体会到实证科学的乐趣；洒脱睿智的谢遐龄老师，让我感受到了思想的力量。而桂勇、孙中欣等青年教师与我建立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成了我一笔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财富，也为我的复旦岁月增加了更多轻松美好的回忆，对于他们帮助我将铭记于心。

接下来，我要谢谢我的朋友们。正是你们的才华、你们的激情、你们的智慧、你们的友谊，一路陪伴我、鼓舞我，让我觉得奋斗的道路并不孤单，生活充满希望。

最后，我要谢谢徐建。我们的经历和千千万万校园情侣一样平淡却充满温情，共同走过的这四年时光，足以让我们在彼此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近半年来，我面临选择、承受着从来未曾体会过的压力，每每在力不从心的时刻都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为我迈出新的一步注入了自信和力量。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岁月中，生活还将赋予更多的内容让我们分担、分享，让我们拥有很多很多共同的过往。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谨以此文纪念我在复旦大学度过的黄金七年！